

东方文化丛书

新汉文化圈

主编 / 季羨林

周一良

庞朴 汤一介



•〔法〕汪德迈 / 著 陈彦 / 译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新汉文化圈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东方文化丛书

● 主编/季羨林 周良 庞朴 汤一介

新汉文化圈

〔法〕汪德迈/著 陈彦/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汉文化圈/(法)汪德迈著;陈彦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

ISBN 7-210-03472-2

I. 新... II. ①汪...②陈... III. 中国-民族文化
-影响-东南亚-研究 IV.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5959 号

新汉文化圈

(法)汪德迈 著

陈 彦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 月第 2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230 千 印张:11.75

ISBN 7-210-03472-2/G·662 定价:24.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E-mail:jxp-ph@tom.net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一部人类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家不论大小,民族存在不论久暂,都或多或少、或前或后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是全世界已经不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文化交流则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现时,我们不能否认,流行今天世界的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百年中创造并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已经产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仍需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化中有益的部分,以发展和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文化。

欧美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历史学家,比如英国的汤因比,从研究全部人类历史中发现,一种文化或者文明都有一个发生、发展、演变、衰退的过程。他们把过去的人类文化或者文明,分成了许多独立的个体。有的个体,比如美洲的玛雅文化,今天已经荡若云烟,不再存在了。有的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发展得如日中天。

一种文化或者文明,怎样才能继续发展,继续前

进,继续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活力呢?关键是除了内因以外,外因也起重要的作用,外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化交流。一种文化或者文明,如果在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以后,就自我欣赏,自我感觉良好,故步自封,墨守成规,这表示,它已经失掉了生命的活力,注定要衰微或者消亡了。这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基本历史事实。

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在五花八门、纷然杂呈的众多的文化或者文明中,显然有文化圈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一个比较广阔的地区内,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或者文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影响了周围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积之既久,就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圈。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从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在非常辽阔的地区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圈内的国家产生了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影响。这影响不是单方向的,圈内的国家间有着文化交流,圈与圈之间也有文化交流,总起来看,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过程。

这样四大文化圈,又约略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西方文化体系,指的是从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一个是闪族、印度和中国的东方文化体系。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两大文化体系表现出来的情况仍然是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交光互影,独立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是在最大的宏观的基础上的文化交流,而且这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哪一个文化体系也不是自一开始就占据着或者永远占据着关键地位、主导地位、支配地位、垄断地位。

在今天的世界上,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那样,流行的是西方文化体系。我们东方国家——在这里,“东方”既有地理含义,也有政治含义,即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国也包含在内,近几百年以来就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寻求真理。到了今天,世界上西方以外的哪一个国家不向西方学习?哪一个国家没有受西方文

化影响？专就中国而论，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文学艺术，甚至我们的风俗习惯和我们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了西方的印记。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不向西方学习，则无法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无法推动社会前进。这个学习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不但今天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绝不能稍稍放松。

但是，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我们的头脑也必须清醒，我们的眼光也必须放远。我们必须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以人类全部历史和整个地球为背景，来观察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样才能看出两大文化体系相对消长、互相学习的关系。最近几百年来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只代表最近几百年的发展。前于此者，情况有所不同，后于此者，情况也将会有所不同。只有放眼观宇宙，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西方文化，了解东方文化，了解中国文化。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况下，准确地给西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给东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确定我们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准确地预见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

我们这一套《东方文化》丛书，顾名思义，就是想给读者以有关东方文化的知识，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东方文化中占什么地位？东方文化当前的作用是什么？衡以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发展前景如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全国人民关心文化问题，是合乎规律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这五个问题，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答案。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文化问题其中也包括东方文化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车载斗量，目迷五色，花团锦簇。我们想在这一面锦上再添上几朵鲜花，共庆升平。对目前注意东方文化很不够的情况，我们想加以矫正或者平衡。因为是丛书，作者很多，探讨的方面也很多，观点就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编委会对此概不干预。每



个人的观点由作者自己负责。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文章达到一定高度的学术水平,材料又翔实可靠,我们就收入丛书中。我们希望真正能做到百家争鸣,而只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行动方针。

季羨林

周一良

庞朴

再版序言

全球范围的现代化潮流,一度使得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经验,也让民主、自由、科学和人权成为人类共同的追求。不过对于中国人而言,受迫性的现代化过程伴随的是屈辱,因此,现代化的历程同时也是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无论是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者还是主张本位文化价值的守成主义者,其背后的立场均是对于民族的独立和自强的追求。这种“救亡压倒启蒙”的状况,使中国人要么倾向于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要么过于坚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或者被动地证明中国文化价值观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一致性。这些都是不幸却又无法避免的事实。

到了 21 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人开始逐步恢复对于自己文化的信心,能够心平气和的探讨普世价值和中国人独特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寻求其中的契合点。借用“学衡派”的一个口号,说就是“昌明国粹,融汇新知”。这样,我们要抛弃那种非此即彼的全盘西化论和一切回归传统的带有复古色彩的保守主义,以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来确立我们的文化立场。

不仅如此,文化问题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全球化是造成文化冲突还是促进文化共存的讨论受到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就目前的情况看,全世界在文化问题上存在着

两种有害的倾向: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和文化上的部落主义。某些西方国家为维护他们的霸权地位,仍然宣扬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国家为了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而陷入了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这两种倾向在我们国家也有不同形式的表现。比如有些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持否定态度,而另一些人则主张 21 世纪亚洲文明将成为主流,这两种看法都不是客观的理性的态度。

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体现的是一种普遍和谐的思想。今日的世界联系非常密切,无论哪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能不关注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世界文化只能是在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化的进程中得到发展。

近年来法国哲学家于连强调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文化,这是一种发现自身文化价值的重要的角度。这种角度其实很早就有,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强,这种角度的有效性被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了。因此,我们不仅需要自己“置身事外”观察自己的文化,也要了解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的。

江西人民出版社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热”的时候,出版了《东方文化》丛书,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些著作既有反映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如汪德迈先生的《新汉文化圈》,也有国内学者对于文化问题的自觉思考的。经过时间的淘洗,许多著作依然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次我们选择了《东方文化》丛书的一些著作再版,又吸纳了《论语与算盘》等著作,还有一些新近编定的文集,既重视知识的累积性,又照顾到时代的发展,定会对当下的中国思想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汤一介

2006 年 4 月

译者的话

在国内日益深入的文化讨论中,汉字对于东方文化的影响利弊,虽受到众多作者的关注,但至今似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方面可能同我国目前语言学的发展状况有关,一方面大概也是由于“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吧。同时,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汉文化区域(或曰汉文化圈)——似乎也未受到足够的注意。在国外,尤其在日本,对汉字,汉字与汉文化圈、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则一直不断,尤其是近年国际上关于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区域转移的讨论兴起之后,这一研究更有加强的趋势。在有着深厚汉学研究传统的法国汉学界,这一研究就展现了良好的势头。1986年法国出版的L. 汪德迈先生的《新汉文化圈》一书,便是一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汪德迈先生(法文名 Léon Vandermeersch),1928年生,法国著名汉学家。严格说来,称汪德迈先生为东方学学家更为合适,因为汪先生研究汉学从来未脱离东亚这个被他称为“汉文化圈”的大背景。正如作者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无论是作为研究员,还

是作为教师,我迄今为止的学术生涯是一半在东亚,一半在法国度过的。”

自1950年汪德迈先生从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毕业到1965年他重返巴黎的整整15年中,汪德迈先生以法国远东研究院研究员身份先后在越南西贡大学、河内博物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香港大学等地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作者足迹遍及包括柬埔寨、朝鲜、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东亚与南亚地区各国,对该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尤其是对东亚地区的文化的整体性与多样性获取了大量的感性认识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1965年,汪德迈先生奉召回法国后,一直孜孜不倦地为研究、传播东亚、中国文化而辛勤工作。1966年,汪先生奉命执教于法国南方埃克斯大学,在该校首创中文教学机构。1973年至1979年,汪先生任巴黎第七大学中文教授,主持法国这个极为重要的东亚语言与文明中心之一的工作达六年之久,培养了大批关于中国与东亚问题方面的人才。1979年后,汪先生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直到1989年12月,他被选为法国远东研究院院长,执掌法国唯一的这个东亚文明的综合研究机构的权柄。

汪德迈先生师承法国知名汉学大师伯希和、马伯乐、戴明维等人的实证研究传统,治学谨严,其大半生贡献给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考证。他1960年出版的《河内路易菲诺博物馆铜镜考》和1965年出版的《法学的形成》两书都是考证精细、论证缜密的专著。他的大部头的博士论文《王道》,分上、下两部于1977年与1980年分别出版,讨论中国古代制度典章、文化与家庭结构,是海外多年来少见的有功底汉学著作。

《新汉文化圈》一书于1986年5月问世,正值国际上关于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讨论掀起高潮之时。该书从历史文化层面上深化了这一讨论。书一问世,旋即被译成日文,获得普遍好评。法国权威报纸《世界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写

道：“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放到历史、文化的整体背景上去考察，是《新汉文化圈》一书的一个重大成功。通过这本书，汪德迈先生给我们指明了现代化并非只有西化一途。”这一点，大概就是汪先生多年在东亚生活和对东亚文化悉心研究的心得结晶以及他希望通过此书向他的“对远东情况了解甚少的同胞们”传达的信息吧。借此机会，译者也希望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他的中国同胞们。

《新汉文化圈》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汉文化区域各国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清理历史的陈迹，医治战争的创伤，步入现代化的道路所走过的不同历程，其中尤以文化部分引人注目。这一部分所占篇幅近半，是本书的重心所在。所以我在此也从文化的角度谈此书的读后感。

所谓“新汉文化圈”，顾名思义，除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外，还加上新近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大部分为华人聚集的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在作者看来，这一文化区域各国无论政治制度如何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怎样悬殊，但在历史上都属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尽管影响——用作者的话讲，叫作“汉化”——的程度有深有浅。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这一地区曾长时间称雄于亚欧大陆东端，与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区域并行不悖。同以上其他几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区域不同，汉文化区域并无一个上帝或一个佛祖来作为其精神支柱，但这一文化区域所表现出来的内聚力并不比任何一个其他文化区域弱，为什么？照本书作者的意思，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共同的文字基础——汉字。

汉字为表意文字，但并非表意文字的唯一形式。从世界历史

上看,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尼罗河流域的古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等都属于表意文字。然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些文字都无一例外地消亡了。只有中华民族的祖先独创的汉字留存至今而且日趋完善。文字史上的这种兴衰现象当然有其众多的复杂原因,但从文字本身应适应表达与交流思想的需要这一点来说,汉字的独存绝不是偶然的。

按照法国大语言学家 A. 马尔蒂内 (Martinet) 的理论,世界上的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分为两种,一种以词素(比如一个汉字)为发音单元,一种以音素(一个音节)为发音单元;前者为表意文字,如汉字、古苏美尔文及古埃及文等,后者则为其他拼音文字。按照一般文字进化规律,以词素为发音单元的文字属于一种初级阶段的文字,它不能适应表达与记录日益丰富、精密的思想的需要,而最终将让位于拼音文字。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便是:对于任何一种拼音文字来说,只要具备几十个拼音字母,或者只需几百个音节就能表达任何复杂的思维过程。然而,表意文字则不同,它需要不断创造出大量的表意符号或曰词素来满足不断增长着的人类思维活动的需要。如古苏美尔文就已经拥有两千多个表意符号!这就造成了记忆与运用两方面的困难,尤其是人类还处于文化发展的童年时代,语言还停留在初级水平之时,这种困难便成为表意文字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导致表意文字的衰亡。然而,历史事实是,汉字毕竟留存下来了,它不仅越过了这一鸿沟,而且日益得到完善。这一点恐怕要归功于我们祖先智慧的“文言”。文言是既区别于古人的“口语”,又区别于我们今天的“书面语”的相对独立的语言系统(而非单纯记录口语的文字符号)。文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系统一直存在。至五四时期,由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寿终正寝了,但它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容低估的,它使得汉字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一种表意文字系统。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给人类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

汉字发展到今天,不仅克服了表意文字系统本身所固有的弊病,而且显示出其不可多得的优点。比如,《新汉文化圈》的作者所注意到的汉语简洁明了的特点,就是同汉字是由甲骨文、金文到竹简再到书籍这样的演化过程不可分的。又如,同表意文字的性质直接相连的直观、形象是汉字的又一重要特点。所谓“望文生义”便是这一特点的表现,而这一点是任何拼音文字都无法做到的。难怪本书作者在书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任何识汉字的读者,即使他没有受过任何专门训练而毫无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素养,在第一次遇到大肠杆菌病、热力学、对数……等术语时都可以发现这些术语与寄生虫学、物理、数学等的关系^①。他绝不至于将比利港^②同一个人混为一谈。”诚然,我们必须承认,汉字有难写、难记、难发音等缺憾,然而一旦闯过了初学的难关,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字词,则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而化劣势为优势,不仅可以弥补为掌握它而耗费的功夫,而且可以赢得时间,加快吸收、消化新知识的速度。根据日本人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信息能在日本得到迅速的传播,很受惠于汉字传达语意的准确、清晰的特点。当然这更得力于日本人对于西方文化思想著述、科技文献等的翻译引进的重视,这个传统甚至可以上溯至明治维新以前的“荷兰学派”。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革命”、“文明”、“经济”等词不都是从日语中“拿来”的吗?

① 上述术语的法文对应词分别为 colibacillose, thermodynamique, logarithme, 分别由希腊文与拉丁文两种词根结合演变而来,作者借以同中文的直观、明晰对比。

② 比利港,法文为 Le Pirée,系雅典的港口。

二

文字是写在器物上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它不可避免地要对思维过程发生影响。借助于汉字这一工具发展起来的汉文化成就无疑是辉煌的。文字又是思想的记录、文化的载体,得力于汉字,汉文化才得以流传经久,光芒远布。

汉字大概于汉代起开始传入越南、朝鲜,并进而进入日本。由于当时这些国家都仅有语言(理解为口语)而无文字,汉字的输入适应了对文字的需求并大大推进了各国文明的进程。经过几个世纪的推广、改造、适应,汉字在上述国家扎下根来,并重重地染上了地方色彩。如日语中除了相当数量的“当用汉字”(1976年“当用汉字”为4520字)外,其“片假名”是采用汉字的偏旁而成,“平假名”则采用了汉字的草书。在朝鲜,在李朝世宗公布其自创文字“谚文”(1446年)以前,汉字一直是其官方文字,即使1446年后,汉字仍然继续流行,一直到现在的朝鲜文里仍保留着中文的发音及形态。汉字对越南的影响更深,汉字一直通行到1918年由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推行由耶稣会教士创设的拉丁化的“国语”为止。汉字的广泛采用,为中国古代各种思想向各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通道,在一千多年的长时间内保证了汉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上述各国,成为这一地区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形态。

回顾汉字及汉文化向外输出的历史,绝非出于“思古之幽情”,更不是陶醉于过去的光荣,而是想借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同汉文化区域各国和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汉文化圈》的作者从东亚这一地区而非从中国一国出发研究汉文化,是有其独到之处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范围大小的问题,而且是为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考察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从而也更为深刻的视角。我们知道,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

力的东渐,亚洲汉文化区域各国和地区经受了极为不同的遭遇。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在争取独立、振兴经济的历程中,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在这里,我们如果暂且撇开政治因素不谈,应该承认目前各国和地区经济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作者提供的数字,1962年日本人均产值为623.7美元,韩国为87美元,朝鲜为120美元,中国约70美元,新加坡424.8美元,中国香港628美元,中国台湾162美元(根据日本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20年后,1982年上述数字依次变为:日本9008美元,韩国1672美元,朝鲜810美元,中国300美元,新加坡5302美元,中国香港4980美元,中国台湾2334美元〔根据香港《远东经济杂志》(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统计数字〕。即是说,1962年日本人均产值较中国仅为9倍,较北朝鲜为5倍,比其他各国平均值为2倍。但20年后,此数字分别为30倍、10倍、2.5倍。在此期间,越南陷入战争直到1975年,但随着战争结束、南北统一,经济也毫无起色。根据越南官方提供的材料推算,1975—1982年越南的经济增长完全被人口增长抵消了,人均产值增长率等于零!事实是无情的。同处于一个文化区域内,何以经济发展水平会如此悬殊?经济发展速度会如此不同?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些国家及地区虽同属汉文化区域,但彼此情况仍然是十分不同的,“汉化”是相对的。但是以华人后裔为主的新加坡呢?同为一个中国的香港、台湾呢?同样,我们还可以设问:何以我国经济建设长期徘徊,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发展速度又显著加快呢?很显然,在这里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快慢的关键并不在于文化因素。将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因素联系起来考虑,有助于我们在对传统文化重新考察时正确把握文化因素的地位。但这里绝非认为文化因素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相反,提出上述情况,是希望文化界能够重视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开掘文化的潜在活力。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邻国——汉文化区域各国为我们提供了